

宋代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薛艳伟

提 要：寺观门是我国古代方志中以记载佛寺和道观为主的一个重要类目。宋代作为我国方志的定型阶段，寺观在宋代方志中的体例和内容基本定型。宋代方志中对寺观的书写体例主要有平列体、纲目体和纪传体三种类型。宋代方志中对寺观的书写内容比较丰富，包罗万象。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表现为寺多观少、内容详略不一、考订精确等特点。宋代修志者设立寺观门的原因是，佛道二教发展旺盛，寺观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寺观已经成为当时方志编纂者不可忽视的事物。

关键词：宋代 方志 寺观 书写 体例

寺观门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一个重要类目，也是在旧志中最为常见的门类之一。所谓寺观，即佛寺和道观的统称。佛寺为佛教僧侣及其信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寺院、僧寺、僧庐、禅院、庵、伽蓝、兰若、精舍、丛林、宝刹等称谓。道观为道教道士及其信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宫、观、道馆、洞、堂、道院等称谓。两宋是我国古代方志的定型时期，体例和内容渐趋于完善，北宋完成了由图经到方志的过渡，南宋时方志正式定型，元明清时期基本沿袭宋代方志的成例。无论是从体例来说，还是就内容而论，寺观门在宋代方志中的书写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形成非常成熟的书写模式，这对元明清的方志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对宋代方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探讨宋代的修志成就和方志理论^①，或

*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清山西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21YJ099）阶段性成果。

① 详参黄燕生：《宋代的地方志》，《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年第4期；洪焕椿：《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潘晟：《南宋州郡志：地方官、士人、缙绅的政治与文化舞台》，《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桂始馨：《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徐庆根：《宋人对地志起源的认识——以宋代方志序跋为例》，舒大刚主编：《宋代文化研究》（第19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83—291页；桂始馨：《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广西地方志》2012年第1期；桂始馨：《宋代方志转型问题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陆敏珍：《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王旭：《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王菱菱、刘潇：《南宋地方政府的方志编修》，《河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王旭：《论宋代的镇志》，《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李昆：《南宋方志的湖泊书写》，《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4期；梁潇文：《宋元方志编修模式与作者群体探析》，《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6期；桂始馨：《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等等。

从微观分析个别宋代方志。^①对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书写的研究成果，则付之阙如。故本文拟从寺观的书写体例、书写内容、书写特点、书写原因等方面对此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 宋之前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东汉明帝时朝廷在洛阳营建白马寺以安置天竺来的两位高僧，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寺院，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寺的修建达到第一个高潮。据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所载，仅北魏首都洛阳一地就有1367所寺院。^②南朝的寺院数量也不遑多让，后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称。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造寺之风盛行。唐中宗时的左拾遗辛替否针对当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③的局面，上疏劝谏皇帝限制佛教，其文中曰：“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④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拆毁全国佛寺达四千六百余所，唐武宗在制文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居。”^⑤由此可见，唐代佛教的兴盛与佛寺的数量之多以及豪华之程度。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最初，道教没有类似佛寺的建筑物。出家的道士选择在一些石室、洞穴、茅棚等场所进行修道和炼丹。不出家的道教信徒，则在家中设一“静室”进行修炼。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道教建筑——道馆和道观，此后道观的修建形成风气，数量大为增加。北齐文宣帝高洋在《问沙汰释老诏》中说：“馆舍盈于山藪，伽蓝遍于州郡……乃有缙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⑥这里说的“馆舍”就是道观，“伽蓝”指的是佛寺，可见当时寺观的修建都很兴盛。唐代统治者奉道教为国教，多次下令在天下普建道观，从而使得道教宫观遍布全国。成书于唐开元

① 详参王瑞来：《〈吴郡图经续记〉考述》，《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沈慧：《略论〈嘉泰吴兴志〉的价值》，《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翟屯建：《论〈新安志〉在方志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期；肖建新：《〈新安志〉续修钩沉》，《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肖建新：《〈新安志〉志源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肖建新：《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游彪、刘雅萍：《〈重修琴川志〉述评——兼论宋元方志的得与失》，《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建军：《宋代名志嘉定〈赤城志〉的历史价值》，《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7期；桂始馨：《〈严州图经〉版本与卷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张保见：《宝庆〈四明志〉述评》，《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3期；高柯立：《〈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管仁杰：《〈（淳熙）新安志〉“嘉庆十七年刻本”质疑》，《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年第2期；高柯立：《南宋时期〈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朱义群：《高似孙〈刻录〉的卷次问题》，《文献》2019年第2期；徐岱：《〈乾道建康志〉及〈庆元建康续志〉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1期；徐岱：《〈景定建康志〉编撰始末考》，《古典文献研究》2021年第2期；等等。

② 参见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5《城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9页。

③ 《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155页。

④ 《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第3158页。

⑤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第605页。

⑥ 北齐文宣帝：《问沙汰释老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卷1，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年间的《唐六典》就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①，这还只是盛唐之前的记录，如果加上中晚唐的数字，唐代的道观总数当远不止此数。

从以上可见，寺观在汉唐之间得到广泛的兴建和发展。那么，寺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何时进入方志编纂者的视野，从而被记载进入方志的文本之中呢？方志在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方志主要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宋代定型方志、元明清继续发展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地记的主要内容有表彰本地之人物、记载地理之沿革、描绘山水之秀丽、叙述地名之由来、介绍各地之水利交通、反映各地之物产风俗。^②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撰并唯一至今保存完整的地记，遗憾的是，该书中不见有关于寺观的记载。刘纬毅整理的《汉唐方志辑佚》一书是目前收集汉唐佚志最为完备的著作，在有关汉唐方志的佚文中，没有单独的关于寺观条目，有的地记只是在记载其他事物时提到寺观。如南朝宋盛弘之在《荆州记》记述长沙的岳麓山时，叙及该山有佛寺存在，记载非常简略，除了提到寺名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信息。^③

隋唐图经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隋唐图经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叙建置的沿革、释地名的由来、述山河的走向、载各地的物产、讲风俗与民情、记名胜与古迹。^④隋唐是图经盛行时期，时人编纂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图经，只是大多已经散佚无存，清人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⑤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留存有几部图经残卷，从而为我们了解图经的体例和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谓是隋唐图经中之遗宝。有些敦煌图经残卷中已经开始记载有寺院，只是文字详略不一。比较详细的如《西州图经》，不仅记载了寺院的寺名、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还用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寺院所处的周边环境和寺院建筑，颇具唐人文风。^⑥有的图经残卷则记载甚为简略，如《沙州图经》云：“寺一：永安。”^⑦《寿昌县地境》云：“寺一：永安。”^⑧《沙州伊州地志》云伊吾县有：“寺二：宜风、安化。观二：祥麟、大罗。”^⑨文中只是简单列出了寺观的名称，没有其他多余信息。由以上可见，寺观作为一项关于地方的地理信息，已经被隋唐图经编纂者正式列入图经的记载范围。只是由于隋唐图经留存至今的太少，且仅凭严重残缺的敦煌图经残卷，我们无法得知隋唐图经有关寺观书写更多的内容。

二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

据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一书考辨统计，两宋志书合计存佚达1031种之多，保存至今者只

①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年，第125页。

② 详参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103页。

③ 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④ 详参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133—137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二四·地理类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21页。

⑥ 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⑦ 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57页。

⑧ 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0页。

⑨ 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7页。

有 29 种。^① 其中以时代而言，北宋方志留存 2 种，即宋敏求《长安志》和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其他均为南宋所修；以地域而言，除程大昌《雍录》为北方地区方志外，其他都为南方地区方志，且以浙江为最多，保存有 14 种，几乎占现存宋志的一半。现存 29 种宋志中，除了淳祐《临安志》（原书 52 卷）因仅存 6 卷，不见有关寺观记载外，其他宋志都记载有寺观。那么，在宋志中，寺观类有哪些书写体例呢？

在我国古代方志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体例，大致有平列体、纲目体、纪传体、三宝体、三书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等，其中又以前三种最为重要和常见，也是旧志中最多被采用的体例。平列体、纲目体、纪传体这三种方志体例在宋代都已经基本定型，现存 29 种宋志基本都采用这三种体例。故下文拟就这三种体例，依次探讨寺观的门类归属。

第一，平列体，又称平目并列体，是指志书中的诸多类目并列平行而互不统摄的体例结构。宋代方志中，采用这种体例最典型的是北宋朱长文纂修的《吴郡图经续记》，全书总共 3 卷，下分为 28 个细目，其中位于卷中的“宫观”和“寺院”两目分别记载道观和佛寺，与其并列卷中的平行类目还有桥梁、祠庙、山、水等。再如，范成大纂修的《吴郡志》全书 50 卷，分为 39 门，其中卷第 31 为“宫观”和“府郭寺”，卷第 32 至卷第 36 皆为“郭外寺”。与之类似的有周淙纂修的乾道《临安志》，该志在卷 1 设立“宫观”一目。淳祐《玉峰志》在卷下设立“寺观”一目，《云间志》在卷中设立“寺观”一目。此外，《澉水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镇志，该志共 8 卷，分 15 门，在卷 5 设立“寺庙门”，专记海盐县澉浦镇的寺院。

第二，纲目体，是指全书先立若干大纲，每纲之下再分为诸多细目，以纲统目的体例结构。纲目体又可细分为三种形式：其一，以大类为纲，以小类为目。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志划分成若干大的事类，每一大的事类再细分为若干小的事类。如史能之纂修的咸淳《毗陵志》将全志分为地理、诏令、官寺、秩官、文事、武备、风土、祠庙、山水、人物、词翰、财赋、仙释、观寺、陵墓、古迹、祥异、碑碣、纪遗 19 门，其中卷第 25 “观寺”为第 9 门，其下又分为“宫观”和“寺”两个小类。再如，孙应时纂修的《重修琴川志》将全志分为叙县、叙官、叙山、叙水、叙赋、叙兵、叙人、叙产、叙祠、叙文 10 门，其第 9 门“叙祠”之下再细分为“寺”“宫观”“庙”“冢墓” 4 个小类。与之类似的还有高似孙《剡录》，该志卷 8 为“物外记”，其下又分为“道馆”“僧庐”两类。其二，以事类为纲，以政区为目。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志划分成若干事类，然后依次叙述该政区所辖下一级行政区域属于本事类的情况。如梁克家纂修的淳熙《三山志》，全志总共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 9 大门类。其中卷 33 至卷 38 为“寺观类”，其下又分为“僧寺”“道观”两类。在“僧寺”类之下依次叙述福州府所管辖的在城（即府城）及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罗源、怀安 11 县寺院情况。又如，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 6 为“宫观”门，卷 13 为“寺院”门，在这两门之下各自载录了湖州府下辖州治、乌程县、归安县、长兴县、武康县、德清县、安吉县等属县的道观、寺院情况。与之类似的有嘉定《镇江志》、宝庆《会稽续志》、咸淳《临安志》、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各门分事类立目，分县叙述，排列井然，有条不紊。其三，以政区为纲，以事类为目，然后分类叙述。如罗愿所纂《新安志》除卷 1 至卷 2，以及卷 6 至卷 9 总论州郡、物产、贡赋、先达、进士题名、义民、仙释、牧守之外。卷 3 至卷 5 叙述新安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 6 县沿革、县境、乡里、户口、田亩、租税、酒税、城社、官廨、镇寨、道路、桥梁、津渡、山阜、水源、古

^① 参见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 页。

迹、祠庙、道观、僧寺、丘墓、碑碣、贤宰等情况，其中“道观”和“僧寺”为各县大纲之下的两个门类。再如，宝庆《四明志》前11卷为郡志，分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9门46子目，第12卷至21卷分志叙述庆元府所属如鄞县、奉化、慈溪、定海、昌国、象山6县的情况，每县皆自为一体，各自为门目，与郡志并列。各县之下门目也参照郡志，各自分叙县、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在郡志和各县志的“叙祠”之下分述所在地的宫观和寺院状况。与之类似的还有景定《严州续志》，该志前4卷为郡志，平行列有33目，卷4有“寺观”目，列举郡城三处寺观。卷5到卷10以严州所辖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分水、寿昌6县为纲，其下叙述有关各县的学校、乡里、官廨、知县题名、山、水、桥梁、寺观、祠庙、古迹、碑碣等情况，其中“寺观”为各县大纲之下的一个门类。

第三，纪传体，是指效仿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以纪、志、表、传为主，杂以考、录、谱、略等体裁，其下再设子目的体例结构。采用这种体例最典型的是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全志分为录、图、表、志、传5种形式。其中是志卷1至卷4为留都录，卷5为建康图，卷6至卷14为建康表，卷15至卷46分别为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10志，卷47至卷49为古今人表及古今人传，卷50为拾遗。该志卷45为“祠祀志二”，叙述建康之宫观。该志卷46为“祠祀志三”，叙述建康之寺院。

以上就是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的书写体例，其中以采用纲目体的方志最多。纲目体的特点是纲有所领，目有所归，便于反映事物间的统属关系，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纲目体比平列体有更多优点，因而得到普遍推广和使用。宋代方志中采用纪传体的仅景定《建康志》一例，该志也成为我国古代纪传体方志之祖，为后世方志编纂者广为仿效。

宋代方志中寺观门目一览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长安志》	宋敏求纂修	北宋熙宁九年 (1076) 修	20卷	不立寺观门
《吴郡图经续记》	朱长文纂修	北宋元丰七年 (1084) 修	3卷	卷中《宫观·寺院》
乾道《临安志》	周淙纂修	南宋乾道五年 (1169) 修	15卷	卷1《宫观》
《新安志》	赵不悔修，罗愿纂	南宋淳熙二年 (1175) 修	10卷	卷3《歙县·道观·僧寺》 卷4《休宁·道观·僧寺》 卷4《祁门·道观·僧寺》 卷5《婺源·道观·僧寺》 卷5《绩溪·道观·僧寺》 卷5《黟县·道观·僧寺》

(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纂修	南宋淳熙九年修	42卷	卷33《寺观类一·僧寺(山附)·在城》 卷34《寺观类二·僧寺(山附)·连江县·侯官县》 卷35《寺观类三·僧寺(山附)·长溪·长乐县》 卷36《寺观类四·僧寺(山附)·福清县·古田县》 卷37《寺观类五·僧寺(山附)·永福县·闽清县·宁德县》 卷38《寺观类六·僧寺(山附)·罗源县·怀安县·道观(山附)》
淳熙《严州图经》	陈公亮修, 刘文富纂	南宋淳熙十二年修	3卷	卷1《寺观》 卷2《寺观》 卷3《寺观》
《雍录》	程大昌纂修	南宋孝宗时修	10卷	卷10《寺观》
《吴郡志》	范成大纂修, 汪泰亨等增订	南宋绍熙三年(1192)修, 绍定二年(1229)续修	50卷	卷31《宫观·府郭寺》 卷32《郭外寺》 卷33《郭外寺》 卷34《郭外寺》 卷35《郭外寺》 卷36《郭外寺》
《云间志》	杨潜修, 朱端常、林至、胡林卿纂	南宋绍熙四年修	3卷	卷中《寺观》
嘉泰《会稽志》	沈作宾修, 施宿等纂	南宋嘉泰元年(1201)修	20卷	卷7《宫观寺院·宫观·府城·会稽县·嵊县·诸暨县·余姚县·上虞县·新昌县》 卷7《寺院·府城·会稽县·山阴县》 卷8《寺院·嵊县·诸暨县·萧山县·余姚县·上虞县·新昌县》

(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嘉泰《吴兴志》	谈钥纂修	南宋嘉泰元年修	20卷	卷6《宫观·州治·乌程县·归安县·长兴县·武康县·德清县·安吉县》 卷13《寺院·州治·乌程县·归安县·长兴县·武康县·德清县·安吉县》
嘉定《镇江志》	史弥坚修，卢宪纂	南宋嘉定六年(1213)修	22卷	卷8《僧寺·寺·丹徒县·丹阳县(缺)·金坛县(缺)》 卷8《僧寺·院·丹徒县·丹阳县·金坛县(缺)》 卷9《道观·观·丹徒县·丹阳县·金坛县》 卷9《道观·院·丹徒县·丹阳县(缺)·金坛县(缺)》
《剡录》	史安之修，高似孙纂	南宋嘉定七年修	10卷	卷8《物外记(祠附)·道馆·僧庐》
嘉定《赤城志》	齐硕修，陈耆卿纂	南宋嘉定十六年修	40卷	卷第27《寺观门一·寺院·州·临海》 卷28《寺观门二·寺院·黄岩·天台》 卷第29《寺观门三·寺院·仙居·宁海》 卷39《寺观门四·宫观·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
宝庆《会稽续志》	张湫纂修	南宋宝庆元年(1225)修	8卷	卷3《宫观·在城·会稽县》 卷3《寺院·会稽县·山阴县·嵊县·余姚·上虞·新昌》

(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宝庆《四明志》	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	南宋宝庆三年修	21卷	卷11《叙祠·宫观·寺院》 卷13《鄞县志·叙祠·宫观·寺院》 卷15《奉化县志·叙祠·宫观·寺院》 卷17《慈溪县志·叙祠·宫观·寺院》 卷19《定海县志·叙祠·宫观·寺院》 卷20《昌国县志全·叙祠·宫观·寺院》 卷21《象山县志全·叙祠·宫观·寺院》
绍定《澉水志》	罗叔韶修，常棠纂	南宋绍定三年(1230)修	8卷	卷5《寺庙门》
淳祐《玉峰志》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修	3卷	卷下《寺观》
咸淳《临安志》	潜说友纂修	南宋淳祐十二年修	100卷	卷13《行在所录·宫观》 卷75《寺观一·宫观·城内外·余杭县·临安县·于潜县·富阳县·新城县·盐官县·昌化县》 卷76《寺观二·寺院·在城》 卷77《寺观三·寺院·城外》 卷78《寺观四·寺院·城外》 卷79《寺观五·寺院·城外》 卷80《寺观六·寺院·城外》 卷81《寺观七·寺院·城外》 卷82《寺观八·尼院·城内外》 卷82《寺观八·尼院·庵·城内外》 卷83《寺观九·寺院·余杭县·临安县》 卷84《寺观十·寺院·于潜县·富阳县》 卷85《寺观十一·寺院·新城县·盐官县·昌化县》

(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开庆 《四明续志》	吴潜修, 梅应发、刘锡纂	南宋开庆元年(1259)修	12卷	卷2《驿·亭·桥·路(寺庙附)》
景定《建康志》	马光祖修, 周应合纂	南宋景定二年(1261)修	50卷	卷45《祠祀志2·宫观》 卷46《祠祀志3·寺院》
景定 《严州续志》	钱可则修, 郑瑶、方仁荣纂	南宋景定三年修	10卷	卷4《寺观》 卷5《建德县·寺观》 卷6《淳安县·寺观》 卷7《桐庐县·寺观》 卷8《遂安县·寺观》 卷9《分水县·寺观》 卷10《寿昌县·寺观》
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纂修	南宋咸淳四年(1268)修	30卷	卷第25《观寺·宫观·寺院》
咸淳 《玉峰续志》	谢公应修, 边实纂	南宋咸淳八年修	1卷	《寺观》(不分卷)
《重修琴川志》	孙应时纂修, 鲍廉增补, 卢镇续修	南宋庆元二年(1196)修, 南宋宝祐二年(1254)增补,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续修	15卷	卷10《叙祠·寺·宫观》

从上表可见, 绝大部分宋代方志都为寺观设立门目, 只是名称不一, 有的称“宫观”“寺院”, 有的称为“道观”“僧寺”, 还有的称为“寺庙”“寺”, 或称为“道馆”“僧庐”等。有的方志如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在唐京城和所属栎阳、泾阳、高陵、渭南、临潼、鄠县、蓝田、醴泉等之下记录有元真观、东菩提寺、大慈恩寺、胜业寺、元都观等寺观, 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寺观门。开庆《四明续志》也没有单独的寺观门, 而是将寺庙附于卷2的“驿、亭、桥、路”之后。而且该志只记载有一处佛寺, 即高桥寺, 因高桥寺依附于高桥而修建, 且供行旅歇脚之用, 正与其所依附的“驿、亭、桥、路”的作用相同。^①

那寺观的门类归属如何呢? 宋代大多数方志都有单独的寺观门, 还有的方志如《重修琴川志》、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等将寺观置于“叙祠”或“祠祀志”。那为什么这些方

^① 参见吴潜修, 梅应发等纂: 开庆《四明续志》卷2《驿、亭、桥、路(寺庙附)》,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 杭州出版社, 2009年, 第8册, 第3628页。

志的编纂者要这样安排呢?《重修琴川志》在“叙祠”类小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故无淫昏以惑世而诬民。今列于祀典者,未必皆有功德也。而山颠水涯,捧揭而奉之者尤众焉。乃者梵宇道宫金碧相望,而不耕不蚕之民蟠据其间者,类悠然自得,可胜叹哉。常熟百里之地,祠仅十一,栖羽流者二三,萃缙徒者五六,不为不多矣。而要皆以保国安民为名,则不可得而废也。”^①作者虽然对寺观的豪华程度和僧道的人数之多表达了不满,但是认为佛道都是宣扬以“保国安民”为目的,不应该废弃。该志将庙、寺、宫观、冢墓并列,置于“叙祠”门。同样,宝庆《四明志》也将神庙、宫观、寺院三者并列在“叙祠”目。这种安排反映了寺观和祠祀之间的密切关系,二者都属于民间信仰的体系,且都是统治者企图通过“神道设教”,并赖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基于这种深远之考虑,宋代的一些修志者将寺观安排到祠祀志中,这种做法被后来的明清修志者广为仿效。

三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内容

纵览现存二十余部宋代方志中的寺观内容,总体来看,宋志中对寺观的记载内容比较庞杂,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但是概括地说,大致有如下十个方面的书写内容:

第一,记载寺观之名称及由来。寺观名称是宋代方志在叙述寺观时都会记载的内容,也是各志都会提供的关于寺观最为基本的信息。有的方志在寺观门类,只是依次列举寺观的名称,别无其他有关寺观的更多信息。有的方志还会叙述寺观名称之由来,如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在载录连江县的大中玉泉寺时说明该寺得名之由来云:“泉出两峰之间,色味澄甘。唐天宝中,浮屠为草庵,依阁梨以栖者百余,引泉自给。其人肋强骨坚,音语铿然,而眸子碧色,寿命弥长。太守奏之,赐名玉泉。至宣宗时乃锡今额。”^②再如,《吴兴志》在记载归安县狮子吼寺时,叙述了该寺名称来由,其文曰:“吴太元中,有居人刘钺尝与费长房睹空中奇兽,金毛五色,哮吼之声三振,遂奏舍宅为寺,因以为名。”^③《新安志》叙述歙县周流院寺名之来源曰:“旧在永丰乡岑山上,郁然孤峰,溪水环之,故寺以为名。”^④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寺观名称是由朝廷赐额,则方志作者会详细记载是哪年或由哪朝皇帝颁布的赐额。如咸淳《临安志》记载余杭县洞霄宫时,特别说明:“国朝大中祥符五年,漕臣陈文惠公尧佐以三异奏,一地泉涌、一祥光现、一枯木荣。赐额为洞霄宫,仍赐田十五顷,复其赋。”^⑤再如,《新安志》记述崇宁观曰:“旧名白鹤观,大观元年八月敕改。”^⑥又如,宝庆《四明志》说云湖庆安院:“周显德四年置,名保安。皇朝治平元年,改赐今额。”^⑦修志者何以如此重视记载朝廷赐额呢?

①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重修琴川志》卷10《叙祠》,“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2册,第1242页。

②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册,第1414页。

③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13《寺院·归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第2617页。

④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3《歙县·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第87页。

⑤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余杭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22页。

⑥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4《休宁·道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第107页。

⑦ 胡榘修,罗潜等纂:宝庆《四明志》卷17《慈溪县志·叙祠·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481页。

在宋代，寺观修造要先到地方官府注册，再逐级上报到中央政府，只有得到朝廷批准才算合法。宋英宗时期，曾在尚书祠部供职的苏颂就曾指出：“兼臣访闻得乡村无名寺院所以众多者，始由僧徒缘化造物数间，谓之佛堂，渐次增添，不数年间便成院宇。次第岁月既久，州县不能穷究因依，或遇朝廷推恩，因指为古迹，为之保明奏报，一蒙赐额，则永为僧舍矣。”^①可见，寺观一旦得到朝廷赐额，意味着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寺观，赐额也就成为寺观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因此，宋代的方志编纂者会特别注重记载寺观的朝廷赐额。

第二，叙述寺观的地理位置。除极少数方志外，绝大多数宋志都会写清楚寺观具体地理位置。如嘉泰《会稽志》记延福院云：“在县西六十里新安乡牛头山之麓。”^②《吴兴志》记载狮子吼寺云：“在县南崇礼乡射村。”^③嘉定《赤城志》记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④此方面的记载甚多，不再举例。

第三，叙述寺观的创建、发展沿革和兴废始末。这方面内容包括寺观的始建时间、创建缘由、寺名沿革、兴废始末等。如《三山志》记叙侯官县西禅寺的兴废沿革云：“号怡山，一名城山，寺压其上。古号信首，即王霸所居，隋末废圯。咸通八年，观察使李景温招长沙泐山僧大安来居，起废而新之。十年，改名清禅，寻又改延寿。十四年，赐紫方袍，号延圣大师，命剑南写开元藏经给之。后唐长兴中，闽王延钧奏名长庆……淮兵焚毁，独佛殿经藏、法堂西僧堂仅存。皇朝天圣间营葺，始就，周垣九百丈，为屋三十楹。景祐五年，敕号怡山长庆。政和八年，余少宰深奏为坟寺，赐额广因嗣祖。宣和元年，改为嗣祖黄箒院。建炎元年仍旧。”^⑤短短二百余字就将西禅寺历史沿革叙述得一清二楚。

再如，嘉定《赤城志》叙述报恩光孝寺历史沿革云：“唐开元中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国朝景德中，更名景德。崇宁二年，因臣僚奏，诏天下建崇宁寺，州以此寺应诏，加‘万寿’二字，遇天宁节，度僧一人。殿后有戒坛，元祐五年僧元照建也。（杨杰为之记）政和元年，改崇宁为天宁。绍兴七年，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以追崇徽宗，改今额。乾道九年，火，僧德光、有权踵新之。淳熙三年，钱参政端礼建僧堂。十年，其孙丞相象祖建佛殿，寺始复旧观，惟罗汉阁无重创者。”^⑥读者在阅读这段文字之后，就可对该寺从古至今的创建历史、寺名沿革、重要建筑的修建等情况有所了解。

第四，叙述寺观的重要建筑、著名景观和所收藏的宝物等。由于民众的大量施舍，宋代的不少寺观修建的富丽堂皇，正如宋代的慈云和尚所说：“今之佛宫，凌云之阁，万木之殿，回廊四

① 苏颂：《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苏魏公文集》卷17，中华书局，1988年，第241页。

② 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7《宫观寺院·寺院·山阴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4册，第1785页。

③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13《寺院·归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第2617页。

④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观门一·寺院·州》，“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351页。

⑤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1427—1428页。

⑥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观门一·寺院·州》，“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351—5352页。

合，台榭相连，万瓦鳞鳞，轩牖金碧，虽世之王公大人之居，不能敌此也。”^①不少寺观以其雄伟建筑、优美景观和珍稀收藏物而闻名当世，并对民众有很强吸引力，因而修志者也会将这些事物载入方志。如《三山志》在记录闽县万岁寺时，列举该寺附属建筑和景观有定光塔、三山阁、平远台、金粟台、一华亭、祈雨僧等，并用简短言语对其一一加以介绍。^②再如，《三山志》记载侯官县雪峰崇圣禅寺景观、建筑和重要收藏物有应潮泉、鳌山阁、枯木庵、留香堂、堂无圣僧、乘云台、无字碑、水磨、难提塔、望州亭、乌石岭、磨香石、文殊台、白云堂、卧云堂、古镜台、鞭斗石、虎豕迹、蘸月池、贝多梵经、汤泉等。^③有的景观，作者还详细叙述其特异之处，如介绍应潮泉云：“广二三尺，水才数寸，进退深浅与潮候无差。四旁皆顽石，中有数沙眼，潮上则涓涓而出，退则复竭。古老相传以为海眼。”^④又如，咸淳《临安志》记载宁寿观收藏宝物有宋高宗《黄庭度人经》、宋宁宗“道纪堂”字、宋理宗《养生论》，以及宋高宗古器玩三种，分别为宋鼎、唐钟、褚遂良书小字《阴符经》，修志者认为“皆希世之珍”^⑤。寺观多以其优美景观和所藏宝物闻名于世，吸引民众前往参观，故修志者将之载入方志。

第五，记载与寺观有关的旧闻逸事等。如淳祐《玉峰志》在“荐严资福禅寺”条记载范成大与之有关的一则掌故云：“范石湖尝读书寺中，屡有诗，载《大全集》及《杂咏》。其后石湖读书处生紫藤，紫蔓可爱，名以范公藤，各有赋咏。”^⑥再如，嘉泰《会稽志》记载陆游高祖陆轸在山阴县延福院的逸事云：“景德初，赠太傅陆公軫与卿士数人肄业于此，尝遇大雪，绝食累日。陆公祷山神，明日获二鹿焉，闻者叹异。及陆公直集贤院，来守乡邦，遣衙校致祭。书堂在寺之西北隅，今寺僧犹能识其处。”^⑦又如，咸淳《临安志》在余杭县的“法喜院”条记载了王安石和苏轼在该寺的行迹，并附录二人在该寺题咏诗各一首。景定《严州续志》记录桐庐县禅定院与北宋著名文人黄裳与南宋名将张浚有关逸闻。这些与寺观有关的旧闻逸事皆为名人事迹，记载这些内容有利于增加寺观的文人品味和提升其文化气息，并容易引起游览者的怀古之思和游览兴味。

第六，介绍寺观的山水风景名胜。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寺观的选址大多在名山胜地，且所在地周围多为一些山水清嘉和风景优美之处。寺观以其清幽环境吸引游人参观，修志者也会将其载入方志。如《三山志》叙述双峰院道：“主峰峭秀，岩谷幽远，危峦四面，缭绕回抱，盖水西之胜处也。”^⑧《剡录》介绍超化院云：“在剡门之北。其后枕剡坑，有林涧之美。”^⑨

① 刘斧：《慈云记》，《青琐高议前集》卷2，刘斧撰，施林良校点：《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 参见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356页。

③ 参见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429—1431页。

④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429页。

⑤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13《行在所录·宫观》，“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第453页。

⑥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册，第127页。

⑦ 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7《宫观寺院·寺院·山阴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4册，第1785页。

⑧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427页。

⑨ 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剡录》卷8《物外记·僧庐》，“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5册，第2429页。

《赤城志》叙述万安院云：“其地深窈，与尘境绝，山环水抱，有茂竹修林之胜，土号方竹源。左升崇冈，重峦复岭如屏列，可眺可咏。”^① 这些描写寺观风景的语句，大多颇富文学色彩，且颇具唐宋山水小品文之风，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七，记载与寺观有关的神异灵验故事。佛、道二教为了吸引信徒，往往编造或附会一些与寺观有关的神异灵验之事，以增加其神秘感，这些故事在当地民众之间广为流传，方志编纂者也会将其采入方志之中。如嘉定《赤城志》在叙及保寿院的“三目观音”时说：“三目者，旧传，天圣初，有一木溯潮而至，泊于院山浮图之下，时见异光，僧惟谅遂以为像奉安，日割然有声，视其目裂为三矣。自是祷者益众，生之日尤盛。”^② 再如，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在圆通妙智教院祈雨甚为灵验云：“有观音大士素著灵异。乾道九年，自浙以东旱甚，钱公端礼来守，以秋后四日开府，亟迎请，罄其精祷，应答如响，注雨弥日，岁遂中熟。”^③

创作和传播类似以上这些与寺观有关的或真或假的神异灵验故事，是佛、道二教吸引信徒的重要手段，也是寺观扩大其知名度的重要方式，这对其教众有很强吸引力，教众多半认为这些神异灵验故事是真实存在过的，并且在他们中间口耳相传。因而，修志者采集到这些故事后将其载入方志。

第八，载录有关寺观诗文。两宋时期，旅游风气盛行，一些著名寺观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游览胜地。文人在游览之余，诗兴大发，会留下不少题咏寺观的诗文。不少宋代士大夫和当时的著名僧道多有往来，互相谈佛论道，有时文人应其邀请，也会创作与寺观有关的诗文。景定《建康志》就指出严因崇报禅寺说：“寺中石碑及时贤题咏颇多。”^④ 因为这些诗文多为名家所作，方志编纂者也会将其收录其中，并附于相关的寺观条目之下。如《吴郡志》在“开元寺”条目下载录与该寺有关诗文有：梁简文《浮海石像铭》、皮日休《开元寺佛钵诗并序》、韦应物《游开元寺》、李绅《开元寺序》、皮日休《早景即事》、皮日休《开（元寺）笋园》、皮日休和陆龟蒙《避暑联句》、薛能《题寺阁》、方子通《程公辟留容开元饮二首》等。^⑤ 再如，《剡录》在“金庭观”条目下，记载与之有关诗文有：张说《题金庭观诗》、唐僧小白《题金庭观诗》、罗隐《送裴饶归会稽诗》、李易《居剡寄郑天和诗》、刘旦《游金庭诗》、仙都李清叟诗、欧阳建世诗、天台金卞诗、羽士叶参先诗、淮南马并诗、四明朱同诗、羽士李太澄诗等。^⑥ 又如，淳祐《玉峰志》在“慧聚寺”条目下，指出“寺多名公诗，并见杂咏”^⑦，并附录与之有关的诗文有唐王洙《天王堂记》、盖珣《慧聚寺山图序记》、辩端《慧聚寺圣迹记》等。^⑧ 这些为数不少的

①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9《寺观门三·寺院·仙居》，“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393页。

②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观门一·寺院·临海》，“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360页。

③ 张洪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3《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5册，第2201页。

④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46《祠祀志三·寺院》，“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917页。

⑤ 详见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6—469页。

⑥ 详见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剡录》卷8《物外记·道馆》，“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5册，第2426—2427页。

⑦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3册，第122页。

⑧ 详见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3册，第122—127页。

诗文，既增加了寺观的文化气息，也为后人辑佚相关文人的诗文集提供了便利，因而在辑佚学上也有很高的价值。

第九，记载皇帝与寺观有关事迹。皇帝作为帝制中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之权威。寺观一旦和皇帝有所关联，则无疑被蒙上一层皇权色彩，也被寺观视为至高之荣耀。因此，宋代修志者对寺观牵涉皇帝的事迹，无不给予浓墨重彩叙述。如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诸位帝后对洞霄宫赏赐云：“绍兴二十五年，旨赐钱重建。乾道二年，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乘輿临幸，御书《度人经》一卷以赐。又明年，太上皇后复来游。淳熙六年，《道藏》成，八年，赐藏经。孝宗皇帝尝赐道士俞延禧画、《古涧松》诗，光宗皇帝又御书‘怡然’二字，赐延禧为斋廡。宁宗皇帝御书‘演教堂’，理宗皇帝赐内帑铸钟，御书《清净经》一卷及‘洞天福地’四大字以赐。”^①再如，宝庆《四明志》依次列举了宋代多位皇帝如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等人与阿育王山广利寺之间的因缘。^②该寺先后得到前后8位皇帝之垂青和赏赐，可谓宠命优渥，因此被修志者郑重其事地逐一载入方志。

类似如上宋代皇帝对寺观的赐字或赐物，都会被寺观视作镇寺（观）之宝而珍藏。寺观如有高僧、道士受到皇帝接见，或者寺观曾被皇帝驻蹕或停留，都会被寺观视为其无上之荣耀，寺观的声誉名望和政治地位无疑都会得到提升，之后也被其僧侣道士认为是值得对外夸耀之事，时常念兹在兹本寺观与皇帝的有关之事。

第十，记载与寺观有关的高僧大德之言行事迹。如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县径山能仁禅院的创建者国一禅师事迹说：“初师之来是山也，猛兽不搏，鸢鸟不击；山下之民，不渔不猎。有白兔二，拜跪于杖屨间；有灵鸡常随法会，不食生类。及师之长安，鸡长鸣三日而死，今灵鸡豕存焉。”^③

再如，嘉泰《吴兴志》记载护圣万寿禅院的开创者如讷禅师的建寺故事云：“唐中和间，有如讷禅师出巡礼，师曰：‘好去，逢道即止。’讷经此山，问何名？父老曰：‘古传号道场。’因欲留止。父老曰：‘此山多虎。’讷策杖直上，坐盘石，虎伏其侧，经三宿无所伤，因结庵使居之。今号其处曰伏虎岩。”^④

类似如上这些寺院因有高僧驻锡而名闻天下，修志者将这些高僧言行事迹载入方志，不仅有利于扩大寺院知名度，而且增加了方志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以上十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的主要书写内容，并不是说所有方志中寺观的书写内容仅局限于这十个方面，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方志中的每一处寺观都包含有如上十个方面内容。宋志中关于寺观的基本书写模式是：“寺观名称+地理位置+创建年代”，在这三项基本内容之外，再根据寺观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搜集状况叙述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除了以上十个方面的内容外，有的方志如宝庆《四明志》、《三山志》还会记载寺观寺田、寺产、旧产钱等与寺观有关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寺观其他方面的记载内容，只是比较零星，也不是十分普遍，兹不举例。

①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余杭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22页。

② 参见胡榘修，罗潜等纂：宝庆《四明志》卷13《鄞县志·叙祠·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第3392页。

③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83《寺观九·寺院·临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348页。

④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13《寺院·乌程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第2614页。

四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特点

第一,总体上来看,各志叙述寺院多而道观少。如《吴郡图经续记》著录寺院35处,宫观7处;《吴郡志》著录寺院合计79处(其中府郭寺30处,郭外寺49处),宫观7处;《云间志》记载46处佛寺,1处道观;嘉泰《吴兴志》著录州治及所辖6县寺院合计220处,宫观19处;《剡录》著录僧庐30处,道馆2处;《新安志》载录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6县僧寺合计达145处,道观合计只有9处;嘉泰《会稽志》著录会稽所辖府城、会稽县、山阴县、嵊县、诸暨县、萧山县、余姚县、上虞县、新昌县寺院合计344处,宫观14处;宝庆《会稽续志》记载13处寺院,4处宫观;嘉定《赤城志》记载415处寺院,24处宫观;宝庆《四明志》记载295处寺院,15处宫观;《三山志》记录僧寺有1318所,道观则只有区区9处。从以上宋志所载寺、观各自数量统计总目,不难看出寺院和道观之间可谓是多寡悬殊。其实,这种宋志记载寺多观少的现象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指出当时作为行在所的临安寺多观少,他说:“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①《重修琴川志》也以常熟为例,指出:“常熟百里之地,祠仅十一,栖羽流者二三,萃缁徒者五六。”^②谢枋得也指出庐陵郡属邑泰和县:“略考图籍,浮图之居百区,老子之宫亦十五区。”^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寺多观少的现象呢?原因在于,总体而言,宋代佛教比道教更加盛行,佛教徒更多,因而造寺更多的缘故。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小序中就指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唐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唐,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④《云间志》也说:“浙右喜奉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故迹其创造岁月而次第之。道宫一附见焉。”^⑤《三山志》卷38“道观”类小序分析当地寺多观少的原因说:“山川胜概,神仙之所栖宅,餐霞饮水,与世迥隔,故耳目不至者,率常以为荒诞……惟道家以清净求不死为术,彼安分委命来乡者寡矣,非若释氏以死后祸福恐动惊怖,故寺院无数,而道观至今才有其九。自非时代好尚,祠宫斋宇,亦卑隘无足言者。”^⑥作者认为,道教主张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最终羽化登仙,对一般安分守己的普通百姓吸引力不强;相反,佛教主张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更能吸引教徒。所以造成寺多观少的现象,而且道观的豪华程度也远远比不上佛寺。

第二,各志所述寺观卷数和内容详略不一,选取寺观入志的标准也不一致。宋代方志中对寺观的记载卷数多寡不一,有的如咸淳《临安志》寺观门所占卷数多达11卷,为全志总卷数九分之一;寺观门在《吴郡志》所占卷数为6卷,为全志总卷数八分之一;《三山志》寺观门所占卷数为6卷,为全志总卷数七分之一;嘉定《赤城志》寺观门所占卷数为4卷,为全志总卷数十

① 吴自牧著,符均、张社国校注:《梦粱录》卷15《城内外诸宫观》,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②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重修琴川志》卷10《叙祠》,“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第1242页。

③ 谢枋得撰:《鹭洲书记跋》,《叠山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集部,第1184册,第886页。

④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14页。

⑤ 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卷中,“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2册,第56页。

⑥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8《寺观类六·道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597页。

分之一，且为全书卷数最多的门类，份量不可谓不重。嘉泰《会稽志》寺观门所占卷数为2卷。有的如《剡录》仅有1卷内容记录寺观，还有的如《云间志》、乾道《临安志》等方志中寺观类内容不到1卷。基于卷数多寡悬殊，各个宋志中寺观书写内容也是详略不一，有的比较详细，有的则甚为简略。即使是同一部方志中，对于不同寺观，记载内容也是多寡不一。在寺观分类上，大多数宋代方志只是将寺观简单地分为寺院和道观两种。有的方志则做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嘉定《赤城志》根据寺院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禅院、教院、律院、甲乙院、尼院等数种，宝庆《四明志》将寺院分为禅院、教院、十方律院、甲乙律院、废院、尼院等数种，这些分类反映了宋代佛教中存在不同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方志选取寺观入志的取舍标准也不一致。如《吴郡图经续记》寺院门小序中说：“寺院凡百三十九，其名已列《图经》。今有增焉，考其事迹可书而《图经》未载者，录于此。”^①所谓《图经》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奉敕所纂《祥符州县图经》一书。《祥符州县图经》所著录吴郡一地寺院有139所，而《吴郡图经续记》著录寺院仅有35处。从上文可见，该志纂修者朱长文只是将《祥符州县图经》所没有记载的寺院收入该志，对于《祥符州县图经》已著录寺院则不再收录。有的方志则只著录比较有名的寺观，如《三山志》称：“自城郭至诸县，以寺兴置先后为次，而山见焉。余非显者不著。”^②有的方志如景定《严州续志》只著录地位比较重要的寺观，该志称：“寺观比前志无大更革，摭其关于郡典者书之。”^③有的方志如宝庆《四明志》、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重修琴川志》、《剡录》、《重修毗陵志》、嘉定《赤城志》将本地历史上曾经存在，但是至修志时已经废弃不存的寺观也记载入志中。以上这些因素造成宋志对寺观的记载方式不同，有的方志对寺观的书写比较简洁有序，有的方志则排列混乱、比较随意，令读者感觉芜杂不堪。

第三，考订精确，指出旧志记载或传闻失实之处。总体上来说，宋代方志编纂者在记载寺观时比较认真，对于寺观各方面内容予以相应考证。如嘉泰《吴兴志》在叙及无为寺时，认为旧图经据《兴国寺碑》记载该寺为“晋王衍舍宅建”的说法是错误的。作者就此提出疑问说：“王衍在东晋时已死于夷虏，何从有宅在江南。不知寺碑之言何所据。”^④再如，《新安志》在“汉洞院”条指出，《祥符州县图经》说该院于“大中二年建”，即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作者根据该院保存的南唐保大中碑称“会昌中废，大中、咸通中复”的内容，考证出该院的创建要早于大中祥符二年。^⑤罗愿在《新安志》中对旧志有关寺观创建时间的错误多有考证，其云：“右此诸寺，凡为吴所建，《祥符经》多作伪唐，今各正之。”^⑥清代学者说该志“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⑦。又如，嘉定《赤城志》著录的天庆观旧称为白鹤观，夏竦在《三官堂碑》认为其缘由是“因茅盈驾鹤上仙故名”。该志作者引用杜光庭《灵验记》和陈师道《诗话》的记载考证出“夏说误也”，指出真正原因是：“唐高宗东封，有鹤下焉，乃诏诸州为老

① 朱长文纂修：《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寺院》，“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1册，第42页。

②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343页。

③ 钱可则修，郑瑶等纂：景定《严州续志》卷4《寺观》，“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2册，第5762页。

④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13《寺院·归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第2618页。

⑤ 参见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3《歙县·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第86页。

⑥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3《歙县·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第88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二四·地理类一》，第1824页。

子筑宫，以白鹤为名。此建观之始。”^① 景定《建康志》编纂者周应合在该志“祠祀志”中，每一处宫观和寺院之下，都以“考证”为题征引各种文献对其进行考订，并一一注明材料出处，反映编纂者在修志时保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所以，清人称赞该志“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②。

五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原因

以上论述了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书写内容、书写特点等有关方志文本的因素。接下来探讨当时的修志者为什么要设置寺观门？也就是说，寺观何以有必要进入方志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两宋时期，寺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至巨，已经成为当时的方志编纂者不可忽视的事物。宋代佛教和道教非常兴盛，上至帝王将相等统治阶层，下至贩夫走卒等平民阶层，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非常多。因此，寺观的修建也非常兴盛。宋代有新皇帝即位后将其出生地或旧邸改建为寺观的惯例。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位于临安的佑圣观原为孝宗皇帝旧邸，也是光宗皇帝诞生地，后被改为道宫；开元宫原为宁宗皇帝潜邸；龙翔宫原为理宗皇帝潜邸。另外，宋代不少皇帝还热衷于在寺观中建造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如宋高宗在太乙宫为自己建造的本命殿曰介福，高宗本人还“车驾尝亲谒焉”^③。宋孝宗亦在太乙宫建本命殿曰崇禧。此外，宋代皇帝和皇后等经常前往寺观参拜。如咸淳《临安志》记载余杭县洞霄宫云：“乾道二年，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乘輿临幸，御书《度人经》一卷以赐。又明年，太上皇后复来游。”^④ 该志记载临安明庆寺云：“中兴驻蹕，视东京大相国寺，凡朝廷祷雨暘，宰执百僚建散圣节道场，咸在焉。淳熙十四年六月、嘉定元年六月、嘉熙四年七月，皆以祷雨，车驾临幸。理宗皇帝回銮撤盖，甘雨随至。”^⑤ 《宋史》也记载说：“天子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寺……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⑥ 由此可见，寺观是宋代帝后常去游览之地。在最高统治者带动下，王侯公卿捐建寺观现象也很常见。如宋初开国大将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⑦。另一开国功臣韩重赞，“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⑧。李崇矩，“信奉释氏，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⑨。

除了这些上层统治阶层外，普通百姓对于崇佛奉道也不遑相让，在捐建寺观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时人指出：“至于浮屠氏则不然，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贫者敝衣菲食之不给，

①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30《寺观门四·宫观·州》，“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402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二四·地理类一》，第1829页。

③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13《行在所录·宫观》，“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第445页。

④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余杭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22页。

⑤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6《寺观二·寺院·在城》，“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33页。

⑥ 《宋史》卷113《礼志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695页。

⑦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第8811页。

⑧ 《宋史》卷250《韩重赞传》，第8824页。

⑨ 《宋史》卷257《李崇矩传》，第8954页。

而闻施于佛，则往往假贷以自效，老而耄者，其自奉养有所不忍，而持以供僧，唯恐其不受也。”^①南宋时期的朱熹指出当时寺观兴盛的状况说：“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数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②《吴郡图经续记》记载该地民众捐建寺院的热情之高曰：“郡之内外，胜利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华屋邃庑，斋饌丰洁，四方莫能及也。”^③普通百姓也经常去寺观游览参拜，宋人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一书描绘当时民众崇佛的盛况曰：“浴佛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国寺。是会独甚（当为‘盛’）。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观者莫不蔬素。”^④西湖老人也说在宋代寒食节前后的西湖“南北高峰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满”^⑤。从中可见，时人信佛之热情高涨。

从以上可见，在宋代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支持和赞助下，不仅寺观修造盛极一时。而且，寺观在宋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活动场所。崇佛奉道作为当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宋代修志者将寺观纳入方志的编纂之中，也充分体现了方志的时代性以及修志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第三，方志有关寺观记载成为文人士大夫旅游指南。佛教僧侣和道教道士在修行时，注重选择在清幽的环境之中，因而宋代寺观多修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水秀丽之处，或在名山大川，或在通都大邑之处。如《新安志》说歙县太平兴国寺，“寺门踞两峰间，下瞰溪流，州西胜处也。”^⑥咸淳《临安志》称富阳县紫霄宫：“雅洁幽爽，亦县之胜概也。”^⑦《重修琴川志》说光明庵：“建在山腰龙斗涧之上，最为胜绝，望之缥缈若仙居。”^⑧宝庆《会稽续志》叙述会稽县千秋鸿禧观风景云：“花光林影，左右映带，风景尤胜，真越中清绝处也。”^⑨余靖就曾指出：“大抵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所以浮屠之居，必获奇胜之域也。”^⑩

寺观以其优雅环境和迷人风景，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颂、余靖、陆游、杨万里、叶适等常去休闲游览之地，他们多与名僧交往和酬唱，在这些名人文集中有大量关于寺观的诗文。苏颂曾言：“每逢幕府文书简，便作湖山佛寺游。”^⑪宋代名相寇准也自称：“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寇准也喜欢寄居在寺院，“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覲则寄僧舍或僦居”^⑫。寇准同样喜读方志，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说寇准“晚窜海

① 周孚撰：《焦山普济禅院僧堂记》，《蠹斋铅刀编》卷2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54册，第654页。

② 朱熹撰：《辛丑延和奏札七》，《晦庵集》卷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43册，第226页。

③ 朱长文纂修：《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寺院》，“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1册，第42页。

④ 金盈之撰，周晓薇校点：《京城风俗记》，《新编醉翁谈录》卷4，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⑤ 西湖老人撰：《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⑥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3《歙县·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第83页。

⑦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富阳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31页。

⑧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重修琴川志》卷10《叙祠·寺》，“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第1247页。

⑨ 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3《宫观·会稽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5册，第2200—2201页。

⑩ 余靖撰：《韶州白云山延寿禅院传法记》，《武溪集》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89册，第71页。

⑪ 苏颂：《走笔奉酬签判殿丞游思上人院》，《苏魏公文集》卷9，第108页。

⑫ 文莹撰：《湘山野录》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①。可见寇准将方志作为旅游指南。

在游览中充分运用方志价值，最典型例子莫如吕祖谦。吕氏在《入越录》中谈到他利用会稽本地《图经》以方便其旅游，其文曰：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华与潘叔度为会稽之游……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凤林寺……八里，下稠岩景德寺。寺屋可百年，绘事皆朴质。饭于小轩，方池丛竹，皆有趣，然稍芜矣……二日……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径至寺。寺盖王羲之兰亭，山林秀润，气象开敞……入水门，过南堰，历府学、天庆观，至禹迹，寺门舍舟。外氏寓舍此寺……又过义恩师院，院与杞菊堂邻，十年前尝识之。午后，自园后门穿僧庵，度小桥，转三两曲至圆通寺。旧乃兴福寺子院，去岁废兴福入圆通，合二为一。扫地更新，面势端直，殿庑华敞，殿后犹未毕工。循旧路，复穿园中归……游大能仁寺，閔壮光丽，甲于会稽，重殿复阁，金碧相照……八日，早，过大中戒珠寺，王右军故宅也……寺后即戴山。戴，菜名。《图经》云：“越王嗜戴，尝采于此。”……十一日……至能仁寺，赴常坦师饭……遂过报恩光孝寺。寺后飞来山，即《图经》所谓怪山也。传云自琅琊飞至，其说不经……十二日雨，不可出，借《图经》寻近城名山，须雨雾遍游。^②

从中可见，在吕祖谦会稽之游中，寺观成为其最多游览之地，他在旅游途中遇到不解之处，曾多次利用《图经》作为其旅游指南和向导。正是基于方志的如此功用，宋代方志编纂者以浓墨重彩叙述寺观，目的就是刻意为人们游览寺观以提供方便和指南，如《三山志》在“寺观类”的“僧寺”小序中明确说：“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而日与市人交臂接席，回视曩昔，异乎吾所闻者。惟是烟霞绝顶，泉石清趣，异时截崖谷，挽藤萝，可望而不可到者。今奔蹄走毂，所至精舍，访古者便之。”^③“访古者便之”一语将修志者设立寺观门的目的和盘托出。与此相应的是，现存宋志中地图保留至今的少数几种方志，如淳熙《严州图经》、嘉定《赤城志》、咸淳《临安志》、咸淳《毗陵志》等，在卷首或卷中所附县境图中都绘制出了寺观地理位置。这样使方志阅览者对该地寺观地理方位一览便知，更加方便其寺观游览。

第四，修志者或从儒家本位的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佛、道，或者以儒家立场调和儒、释、道之间的关系。前者如嘉定《赤城志》在“寺观门”小序叙述该志设立寺观门的原因为：“自佛老氏出，摩荡掀舞，环一世而趋之，斯道殆薄蚀矣。粗之为祸福，使愚者惧；精之为清静寂灭，使智者惑。盖其窃吾说之似，以为彼术之真，如据影搏物，而熟视之则非也。以故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当为‘庐’）道宇者四百有奇。吁，盛哉！今吾孔子、孟子之像设不增，或居仆漫不治，而穹堂伟殿独于彼甘心焉。岂其无祸福以惧人，而无思无为之旨反出清静寂灭之下耶？今笔录之，非以滋惑，亦使观者知彼之盛，而防吾之衰，庶少补世教云

① 文莹撰：《湘山野录》卷上，第9页。

② 吕祖谦：《入越录》，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主编：《全宋笔记》第9编，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8册，第182—188页。

③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7册，第1343页。

尔。”^①该志作者认为，佛道二教以善于蛊惑人心来吸引信徒，造成寺观修建大盛局面。反观，孔孟之像的修造则不受重视，作者表达了对此的隐忧。最后，作者指出其设立寺观门，不是为了“滋惑”，仅仅让读者知道寺观发展的盛况，而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兴儒学，以期补益于当时世道人心。对于后者，则如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寺观门小序中所说：“君臣尊卑上下之分，非人之所为，天之所设也。彼二氏者，岂能外吾圣人之道而自立哉？特其所从入之异路，故为其徒者必服其教，服其教者不得不世守其说，守其说则不能自遁于其名。要之，尊君亲上之心则一也。今寺若观率以得列御前为重，而其奉三宫元命，以祈千万寿，则晨烟夕灯，鼓螺钟磬，梵呗之音，步虚之声，隐入霄汉，而散落林谷者，相望不绝也。斯亦勤已。呜呼，彼于吾儒尊君亲上之说，概尝有闻否哉？叙寺观。”^②潜说友认为，在“尊君亲上”说上，佛、道和儒学并无根本区别，三者都可以作为统治者控制百姓及教化民众的工具和手段。潜氏这种说法反映了随着佛教、道教和儒学之间的不断交流、融合和互相渗透、吸收，南宋时期三教合流趋势愈加明显。佛、道二教作为与儒学并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对于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精神风貌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儒学出身的宋代修志者，无论是批判佛、道，抑或是调和儒、释、道，都反映出宋代佛、道二教对时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小 结

总之，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渐次传播和普及，佛寺和道观修建也不断兴盛起来。留存至今的作于这一时期的地记佚文中，没有发现有单独关于寺观的条目，只是在记叙其他事物时，附带提及寺观。到了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更加繁荣，据敦煌图经残卷所知，隋唐图经已经开始记载寺观，只是数量极少，而且内容甚为简略。两宋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人崇佛奉道气氛非常浓厚。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寺观兴建遍及国土各个角落，社会各个阶层都热衷于游览寺观。寺观成为宋代社会各阶层常去的公共活动场所，而且在宋人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宋代城市空间布局中，寺观也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在宋代方志地图中能得到清晰而明确反映。方志发展到宋代已经趋于定型，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和内容也基本趋于成熟，并对后世方志对寺观的书写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观门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1册，第5351页。

^②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第1214页。